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文艺学系列教材

丛书主编 童庆炳

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

陈太胜 主 编

ERSHI SHIJI
XIFANG WENLUN
XINBIA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文艺学系列教材

丛书主编 童庆炳

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

ERSHI SHIJI XIFANG WENLUN XINBIAN

陈太胜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 / 陈太胜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3-11975-2

I. ① 2… II. ① 陈… III. ① 文学理论—西方国家 20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324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20.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李洪波 郭 瑜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言

本书是为大学本科学学生编写的介绍 20 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入门教材，名为“20 世纪西方文论新编”。从解释本书的名称开始，说明本书的内容、体例与编写意图，或者是一个简明又有效的方法。

“文论”这个概念，在最近的中文表述中，有学者赋其新意，认为它是中文翻译的一种创举，其内涵大概等同于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理论”概念。亦即是说，这里的“文”不是被理解为“文学”，而是“文字”，这样，“文论”就成了文字或文本的理论。^①这种新说提供的其实是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言说方式。据我了解，就中国大学教育中相关课程的设置来说，“文论”本来只是“文学理论”这一称谓的简称。在各大学普遍开设的所谓“西方文论史”，其实只是“西方文学理论史”的简称而已，本来并没有这样的深意。当然，对“文论”的这种新的释义倒是提供了重新思考其涵义的机会。这里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介绍和学习西方文学理论的指向问题，一种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这样，介绍精神分析学，更多的还是介绍与文学批评相关的部分。另一种是以理论为中心的更大范围的研究。像女权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指涉范围广大的理论，它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社会学理论，也是文学理论。其

^① 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导言》，见张中载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另见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导言》，见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实，由“文学的理论”到“理论”代表了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的一种变化。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的批评家经常认为文学理论是“仆人的仆人”，服务于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任务是通过解释文学杰作为文学服务。这样，文学理论就成了“批评的批评”。批评作品的标准是它成功地激发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理论研究的标准是它成功地帮助批评家提供阐释的更好方法。^①上述这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即上文说的以文学为中心（其主导文类通常是抒情诗、小说和戏剧）的理论。当然，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变化，卡勒写道：“然而，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文学理论应当被设想得有所不同。不管文学理论作品给予阐释什么样的影响，它们都紧密并必然地和别的写作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还没有命名但经常简短地称为‘理论’的领域。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最惹人注意的作品并不明确地针对文学。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这一术语，因为它不仅包括了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欧文·戈夫曼和拉康，也包括黑格尔、尼采和汉斯-乔治·戈德曼。它可能应被称为‘文本理论’，如果文本被理解为‘任何用语言表述的东西’的话，但最方便的称谓就是简单地称之为‘理论’。”^②卡勒甚至认为这种理论写作的领域已经称得上是一种“新文类”。几乎与卡勒的描述同时，杰姆逊也说：“一代人之前，依然有职业哲学的专门话语以及与之相应的完全不同的其他学科的话语，譬如政治科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可是今天，我们有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就叫做‘理论’的写作，它同时涵盖了这一切学科。”^③他们描述的其实是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同一种现象，即：在各种文化理论兴起以后，理论写作所具有的跨学科写作的性质。理解上述这种变化，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学习相当重要，尤其是对理解 60 年代后期以后的各种文化理论有相当重要的帮助。当然，只要对本书的目录稍加浏览，就不难发现，本书的介绍实际上还是以“文学”的理论而非“文本”的理论为基础的。这是考虑到我们这一课程主要还是作为文学课程的一种而设置的。

“西方”这个概念在中文的语境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任何使用这个词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很大的看似明确实际上又相当模糊的概念。如

①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7.

② Ibid., p. 8.

③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见 [英]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2~3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果你能设身处地站在北欧、东欧的一个国家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话，你就不难理解，中文语境中的“西方”概念也有可能成为粗暴“话语”的一个范例。如果用它来讨论文学研究，北欧或东欧某个国家的学者（甚至是意大利的学者）会质疑我们所谓的西方太狭窄，太以英语相关的理论为中心。或者说，在我们的心目中，所谓的西方，说到底只是一种德法理论，或德法理论翻版的美国理论。因此，我们只能坦白地承认，我们的介绍不能脱离这种文化上的政治现实。本书的章节安排尽管主要考虑时间因素，但地域因素也隐现其中。第一章关于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主要源起于德语，而其影响通过荣格、弗莱、拉康等人扩大到法语和英语领域。本书特意把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放在一起，作为俄语世界的文论代表。而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两章则代表了法语世界的文论怎样影响并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英语文论的内涵与言说方式。书的最后四章讨论的主要是英语世界（主要是美国）的文论。

“20世纪”指刚刚过去的一百年的时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迁。技术的突飞猛进、大规模的战争、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生态环境的破坏都在这个世纪同存。而种种社会的、政治的变化无一不反映在人文学科各领域的发展变化当中，处于其中的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在这个世纪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这两大转向值得重视。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使语言问题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在这种“转向”中，语言、语言学模型、语言哲学等，被视为知识领域中最重要东西。正是这种“语言论转向”，导致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基础的文论流派的产生。本书讨论的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无一不以语言问题为自己关注的重心。

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动荡时期。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60年代”视为一个专有名词，并认为这是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出现了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特别是反对美国的越战）、民权运动（特别是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1968年5月发生于巴黎的名为“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反对越南战争。这些反抗运动的矛头指向西方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方式、两性关系、种族关系、伦理道德、科学、美国的政治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动荡时期，西方世界出现了左倾色彩很浓的政治倾

向，激进的青年学生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他们还把资本主义的反叛者古巴的卡斯特罗、格瓦拉尊为英雄，激烈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人文学科领域大行其道。文学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文论流派，一方面，它们是在当时政治色彩很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因之也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也对这种社会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文论流派的政治性，可以用后来文化研究的学者所说的“文化政治学”一词来概括，它追问的往往是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内涵，以及这种内涵又是在怎样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都是对既有的某种政治秩序的“解构”。在这当中，福柯在话语理论中提出的“权力”问题，成了这些文论流派的一个关键词。权力无处不在，权力被用来理解阶级（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后殖民主义）和性别（女权主义）。换言之，文学研究中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问题，都以对“权力”的内涵及来源的追问的形式得到了特殊的强调。

当然，这种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又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在新的政治旗号下对 19 世纪曾经流行的文学社会学的简单复辟，在某种意义上，它并没有偏离“语言论转向”的基本学术背景。有意思的是，“语言”一词在这儿被福柯（或巴赫金）意义上的“话语”一词所取代。对“话语”的研究，不是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的关系之类的“纯语言学”研究，而是一种研究语言的说者与听者，及语言交际的语境的“超语言学”研究。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类似于“谁说的？”“为什么说？”等问题。这样，“语言”就变成了处在社会交际与社会关系中的“话语”，而“文化政治学”也正是一种追问“话语”背后的“权力”的政治学。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文学研究的倾向，具有某种形式的“文化论转向”特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的阐释。此前各种建立于文学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的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关注文学文本本身甚于关注社会文化与历史，而 60 年代后兴起的文学研究方法则无一例外地强调，是文化、历史和其他相关的因素决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甚至文本的涵义也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要广得多。在这些文学研究方法看来，语言（话语）的涵义很广，包括各类话语、文字作品、文学、艺术、社会活动和任何个人或集体依赖把观念和行动施加于他人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这样，把文本视为处于活动中的文化，这些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就在文本、语言和话语的旗帜下跨越了学科间的樊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和别的学科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在文化研究中，正如一切无往而不是文化一样，现在一切无往而不是“文本”了。很快地，文化研究以大众的名义扩张了文本范畴，影视、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城市等和文学一样成了文化研究的范围。

本书书名中的“新编”一词代表了本书在编写体例上的新的尝试。本书的目的是兼具“读本”和“导论”的双重功能。本教材打破传统的同类教材的编写思路，把“经典文本阅读”与相关的理论介绍（在本书中称为“相关问题概说”）放在一起。“经典文本阅读”选择文论派别中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所选文本侧重批评实践，它的分析对象往往与本科学生熟悉的文学作品有关，有利于本科学生的理解；同时，通过“作者简介”与“文本解读”引导学生对理论文本进行阅读。“相关问题概说”侧重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该章所讨论的文论流派作扩展性地介绍和讨论，使学生对该文论派别有较系统完整的了解。同时，“思考题”与“辅助阅读材料”也是本书设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思考题”是从此章内容合理延伸出来、供学生进一步思考、加深其理解的问题。“辅助阅读材料”是为学生开的进一步阅读文章或书目，并有简要说明，供有兴趣的学生进一步阅读和研究之用。

本书是分工合作的产物，全书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陈太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四章、第五章、第九章 刘涵之（湖南大学文学院）

第七章、第十三章 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章、第八章 第十二章 罗成（中山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第一章 精神分析批评	1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1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18
一、压抑、本能与无意识理论	18
二、梦的解释	21
三、三重人格理论	23
四、作为白日梦梦幻者的作家	24
五、作为本能的升华的艺术	25
第二章 新批评	30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30
悖论语言	30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47
一、新批评的兴起	47
二、新批评的作品本体论	48
三、新批评的诗歌语言研究	51
第三章 神话—原型批评	56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56
文学的原型	56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70
一、原型批评的渊源	70
二、荣格的神话—原型批评	71
三、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	75

第四章 俄国形式主义	80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80
论艺术的现实主义	80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90
一、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	90
二、“形式方法”的理论	92
三、“文学性”与“诗学的任务”	93
四、“奇异化”或“陌生化”	95
五、“文学系列”	97
第五章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100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100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	100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111
一、言语体裁与对话的主体意识	112
二、从对话到复调	114
三、对话的狂欢式感受	117
第六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	121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121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121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136
一、历史发展	136
二、理论假设	139
三、重要流派代表及观点	140
第七章 读者反应批评	144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144
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144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157
一、历史发展	157
二、理论与方法	160
三、主要特色及评价	163
第八章 结构主义	166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166
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	166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178
一、历史发展	178
二、理论假设	181
三、结构主义研究路径	183
第九章 解构主义	187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187
辩解《忏悔录》	187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209
一、解构主义的兴起与德里达的开创作用	209
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举隅	212
三、耶鲁解构主义的“误读”理论	215
第十章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220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220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220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235
一、历史发展	235
二、理论假设	237
三、文艺复兴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241
四、日常行为的诗学与文化研究	244
第十一章 后殖民主义	246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246
东方化东方	246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257
一、后殖民主义的兴起	257
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	259
三、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	264
第十二章 女权主义	269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269
恋母情绪	269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286
一、历史发展	286
二、理论假设	289
三、学术派别	293

第十三章 文化研究	294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294
当代文化研究方法	294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302
一、历史发展	303
二、理论与方法	306
三、主要特色及评价	313

第一章 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是指用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文学的批评。其代表人物除创立者弗洛伊德外，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还包括了一般被视为神话—原型批评代表人物的荣格与弗莱，及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者拉康。

本章在“经典文本阅读”部分选择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文章以精神分析学理论(特别是“俄狄浦斯情结”)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人格与小说写作的关系。在“相关问题概说”中，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几个主要理论观点及文学批评作了进一步介绍与评论。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弗洛伊德)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里，可以区分出四个方面：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一个人怎么会陷入如此令人迷惑的复杂情况里去的呢？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最少受到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玛卓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于估量的。可惜，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个问题面前，精神分析学是无能为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道德家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点。如果我们企图把他作为道德家加以高度评价，理由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我们便忽视了因此而引起的怀疑。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心里一感到诱惑就对这诱惑进行反抗，而绝不屈从于它的人。一个人，先是犯了罪，然后又在自己的忏悔中树立高尚的道德准则，这样他就会受到谴责：他使事情对自己变得太容易了。他没有获得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因为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实际的人类利益。他使人想起大规模迁徙的野蛮人，进行屠杀，又以苦行赎屠杀之罪，直到苦行变成进行屠杀的一种实际手段。“恐怖的伊凡”就是这样干的。的确，向道德的妥协是俄罗斯人典型的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道德上所做的种种努力，最终结果绝不是十分光彩的。经过一场使个人本能要

求与社会主张调和起来的激烈斗争之后，他最终落到了一种既服从俗权又服从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和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卑微境界——这是那些二三流的思想家毫不费力就可以达到的境界。这正是这个伟大个性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使自己与人类的看守在一起。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将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人们也许可以说，因为他的神经疾病，他注定了要以失败告终。他的伟大的智力和他对人类之爱的力量本来可能会向他打开另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罪人或罪犯，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并不需要根据对罪犯的世俗判断。这种反对的真正动机很快就变得明显了。罪犯身上一般有两种基本特征：无节制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性冲动。两者的共同点，并作为它们表现出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爱的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欣赏力的缺乏。人们会立即想到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是相矛盾的——他对爱的极大需要和他巨大的爱的能力，这些可以在他夸张的仁慈的表现中见到，这些使他在有权去恨、有权去报复的场合中去爱、去帮助人，例如，在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她的情人的关系中就是如此。这样的话，人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想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罪犯呢。答案是来自他选择的素材，他选择的全是暴戾的、杀气腾腾的、充满利己主义欲望的人物，这样就表明了他的内心有着相类似的倾向；答案还来自他生活中的某些事实，像他的赌博嗜好，他的关于强奸过一个少女的事的坦白，这一坦白可能是真的。^①如果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本能——这种破坏本能本来很容易使他变成一个罪犯，在他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针对他自己（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并以受虐狂和罪恶感表现出来。这样来认识，上述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了。然而，他的个性中留有大量施虐狂特征，这些特征在他的容易烦躁，爱受折磨和甚至对他所爱的人不能容忍中表现出来；也在他作为一个作家，对待读者的方式中表现出来。这样，在小事上他对别人是施虐狂者，而在较大的事情上他对自己是施虐狂者，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受虐狂者——也就

^① 见弗罗·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中关于这些事的讨论（1926）。斯蒂芬·茨威格（1920）写道：“他没有被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所阻挠，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越出法律的界限有多么遥远，或者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有多少犯罪本能是在他身上实现了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与他的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弗罗·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中开头的介绍性的章节里莱尼·弗罗·米勒的叙述（1925），此章是以 N. 斯特拉珂夫著作（1921）的内容为基础的。——强奸幼女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几次出现，特别是在遗作《斯道罗舍的忏悔》和《一个伟大罪人的生活》中。

是说，他是一个最温和、最仁慈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个性中挑选了三个因素，一个是数量的，两个是质量的：他的感情生活的特别的强烈性，他天生反常的本能气质（这种气质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一个施虐—受虐狂者，或一个罪犯），和他那无法分析的艺术天才。这个结合可以在不犯神经病的情况下完好地存在着；有的人就是单纯受虐狂而没有神经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能要求和对这些要求的克制力（加上有效的升华方式）之间的力的对比如取得平衡，就必然会使他归入所谓的“本能性格”的一类人物。但是这个情况被同时存在的神经病弄得模糊了，正如我们说过的，神经病在这个情况中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越频繁发作，自我控制的情况就越混乱。因为神经病毕竟仅仅是自我无力进行综合的一种迹象，就是说自我在企图那样做的时候，却已丧失了它的统一性。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病是如何表现的呢？他把自己称作癫痫病人，别人也这样认为。病发作起来很猛烈，伴有丧失意识、肌肉痉挛和随之而来的抑郁状态。这个所谓的癫痫病很可能只是他的神经病的症状，从而必须把它划归为歇斯底里癫痫症，就是说，一种严重的歇斯底里症。这一点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一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癫痫症的病历资料是不完全的和不可靠的；二是我们对癫痫症发作的有关病理状态的了解还不充分。

先来谈谈第二点。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完整的癫痫病理学，因为这不会使问题得到决定性的说明。不过也可以谈一点。古老的癫痫症的症状在临床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疾病伴随着难以预测的、平白无故的痉挛发作。患者的性格会变得暴躁和爱寻衅闹事，所有的精神官能逐渐削弱。但这里概述的图像轮廓并不十分精确。这病发作时来势凶猛，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导致严重自我伤害的危险的癫痫状态，不过也可能使病人处于短时间的意识丧失，或一阵突发的晕眩，或者可能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做事与其性格不符，好像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发作虽然一般说来是纯粹的肉体的原因决定的，这些肉体的原因以一种我们还不理解的方式作用着，不过，可以把它们的第一次发作归因于纯粹精神上的原因（例如，一次恐吓），或者说第一次发作是对另外一些精神刺激所起的反应。尽管典型的智力损伤现象可能在压倒多数的病例中存在，但是，至少在我们知道的一个病例中（赫尔姆霍兹的病例中），疾病并未妨碍他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可以作出同样断言的病例也许是有争论的，容易受到怀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那些癫痫症患者可以给人一个迟钝和发育受到抑制的印象，这种病往往伴有极明显的白痴现象和极严重的大脑缺陷，纵然这些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临床症状。但是，某些程度不同的发作也会发生在一些智力发展良好的人身上，和有着过分的、经常失去

控制的情感生活的人身上。难怪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发现，认为“癫痫病”单纯是一种临床上的存在已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在一些明显的症状中发现的类似之处好像需要作出机能上的说明。仿佛可以认为人体中有机地存在着一个反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可以作用于相当不同的情况中——既可以作用于严重的组织解体或中毒性疾病所引起的大脑活动障碍的病情中，也可以作用于对精神机能控制不足和精神能量的活动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中。在这两种情况的后面，我们瞥见了潜在的本能释放机制本身。这种机制不能远离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中毒的来源；古代的医生们把性交说成是一种轻度的癫痫，由此而认识到性行为中释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应。^①

这个共有的因素可以称作“癫痫反应”，无疑也受到神经官能症的支配。这种神经官能症的实质是用肉体的方法排除大量的刺激，这些刺激已无法用精神的方法来对付。所以，癫痫的发作就成了歇斯底里症的一种症状，也就像正常的性释放过程一样。因此，区分官能的癫痫和“情感”癫痫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第一种病人是大脑患病，而第二种人是神经患病。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精神生活受到来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扰，而在第二种情况中，这种纷扰则是他精神生活本身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其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严格地说，这还不能得到证明。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把他最初几次发作的症状和后来的几次反复安排到他的精神生活的整个历程中去考察，但在这方面，我们所知甚少。对他癫痫发作的描述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掌握的他的癫痫发作的情况和他的经历之间关系的材料既不完全，又常常自相矛盾。最有可能的设想是，这种发作远远溯源于他的童年时代，它们开始表现为较为轻微的症状，而并不表现为癫痫症形式，直到他十八岁时的那次惨重的经历——他的父亲被害^②——以后，它们才以癫痫症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在他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

① 参见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发作的早年论文(1909)。

② 参见莱尼·弗罗·米勒的著作(1924)。也见于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描述的文章(1921)。特别有趣的资料是记述着在作家童年，“一些可怕的、难忘的、极其痛苦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病的第一个征兆就可以上溯到这些事情上去(见苏沃林刊登在1881年《新时代》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关于弗罗·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的介绍文章，1925年)。也见于奥莱斯特·米勒的著作(1921)，他写道：“这里另有一个特别的例证，是关于法奥德·米海尔洛维奇的病的，这病与他年轻时候的生活有关，并且与他双亲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件悲剧事情有关。虽然这个证明是法奥德·米海尔洛维奇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口头提供给我的，但我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复述它，因为我没有关于这个传说的其他任何方面的证据。”传记作家和科学研究工作者不会感激这样的处理。

病症完全停止发作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对我们的说明是相当有利的，但是这和另外一些说法却有矛盾。^①

《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父亲被害，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父亲的命运之间相当清楚的联系，引起不止一个写他的传记的作者的注意，并引导他们去请教了“某一现代心理学派”。从精神分析学(它的意义就是进行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企图了解那个事件中最严重的损伤，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反应看作他的神经病的转折点。但是，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证实这一看法，我就不得不冒着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学术语和理论的读者感到困惑难解的风险。

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几次发作的意义，在他小时候，在“癫痫症”发生很久以前，他就有过几次发作，这些发作具有死亡的意味：它们的先兆是对死亡的恐惧，它们的症状是昏睡、嗜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这病以一种突发的，毫无理由的忧郁形式，一种情感形式首次出现在他的身上，就像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梭罗维也夫那样，仿佛他当场就要死去似的。实际上，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真正死亡极为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甚至费奥多还相当小的时候，他在睡前常常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怕他夜里可能会沉睡得像死去了一样，因此他请求一定要将他的葬礼推迟五天举行(参见弗罗·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年)。

我们知道这种死一样的发作的意义和目的。^②它们意味着发病者以死者自居，不管是以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自居，还是以一个还活着的，而主观地希望他死亡的人自居。后一种情况意义更为重大。这个发作就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死去，现在这一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他自己死去了。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主张，对一个男孩子来说，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这种发作(它被称为歇斯底里的发作)是由于希望他可恨的父亲死去而做的一种自我惩罚。

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弑父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一种基本的和原始的罪恶(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在任何情况中它都是犯罪的主要根

① 许多记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记述，都表明与此说法相反，认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期间，这病表现为残留的癫痫特性。不幸的是，这里有理由来推翻神经病人的自传叙述。经验显示出，他们的记忆已经受到歪曲，这种歪曲意在阻断与某种不合意的原因的联系。然而，确实存在的情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监禁生活，显著地改变了他的病情。参见弗罗·米勒的著作(1924)。

② 这个说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2月8日致弗莱斯的信中已经表述过了(弗洛伊德，1950)。